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李玲, 张立明*, 谭本宇
(湖北大学 旅游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 文物保护单位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 记录着历史的印记, 研究其时空分布有助于保护和传承。文章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缓冲区分析等方法研究湖北省1260处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时序方面: (1)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时间跨度大, 自史前至近代均有分布, 经历了萌芽、缓慢增长、急速下降和快速拉伸的发展脉络, 主要集中在史前、先秦、明清和近现代四个时期; (2) 各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在分布方向、范围、重心上差异明显。空间方面: (1) 总体空间分布呈集聚型, 除明清时期为分散型外, 其他时期均为集聚型; (2) 空间演化逐渐形成“一心多点”的特征, “一心”是以武汉市为中心; (3) 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受地形地貌、河流水系、交通、城市中心以及历史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文物保护单位; 时空分布特征; 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 K872;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59(2025)02-0050-11

文物保护单位是指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统称^[1], 这些文物承载着历史记忆, 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与创造力, 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近年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2021年《“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文物事业, 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统筹各类文物资源普查和名录公布, 编制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 逐步将文物保护和利用的视角转向整体性^[2]。因此, 深入研究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有助于加深对文物的整体认识, 推动保护工作向更科学、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查阅文献发现, 对于文物保护单位, 国外学者多将其置于文化遗产的框架进行研究, 侧重研究文化遗产价值评估^[3-4]、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5-6]、文化遗产旅游开发^[7]等。国内学者逐步从文化遗产的框架中将文物保护单位分离出来, 对其进行独立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 起初学者们主要从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等角度进行研究, 注重考察文物的历史渊源、建筑风格和考古价值等。然而, 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的兴起, 地理学视角逐渐被引入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中。从研究内容来看涉及以下几方面: (1) 文物保护单位现状调查。例如, 刘明欢^[8]对贵州平塘县32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调查研究, 了解该县文物保护单位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李文强^[9]对宝鸡市101处文物保护单位从保护、利用、管理、研究四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王益^[10]对凤冈县48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存现状及“四有”情况进行评估。(2) 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化特征。李蝶等人^[11]发现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单位在时空演变过程中, 大多数时期集中分布在中东部; 岳菊等人^[12]发现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步向北京、天津迁移。(3) 文物保护单位影响因素。吴佳倚等人^[13]研究发现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受地形、水系、政治历史、交通等因素的影响; 康雪琴等人^[14]发现青海省551处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地势平缓、接近河流、政治环境稳定的区域; 董洁芳等人^[15]借助地理探测器, 选取十种因子分析影响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异的原因, 结果显示, 人口、高程及历史名

[收稿日期] 2024-03-20

[修回日期] 2024-04-18

[作者简介] 李玲(1994-), 女,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方面研究, E-mail: 18135515528@163.com.

* [通讯作者] 张立明(1966-), 男, 教授,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人文地理学方面研究, E-mail: zlm@hubu.edu.cn.

人对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研究主题层面,涉及工业遗产类^[16-17]、矿业遗产类^[18]、红色遗产类^[19-20]、农业遗产类^[21]不同类型文物保护单位。研究尺度上,奚雪松等人^[22]和田小波等人^[23]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类型角度对全国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研究;林晓峰^[24]、徐卫民等人^[25]、郭宏琴^[26]和白如山等人^[27]分别对浙江省、陕西省、江西省、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蒯慧媛^[28]、赵春梅等人^[29]、王崇岩等人^[30]分别对武威市、成都市、西安市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较少,且不同地域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时空演化特征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文章以湖北省作为研究区,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缓冲区分析等方法,探究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为未来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决策支持。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理位置优越,北与河南相依,南接湖南、江西,西靠重庆,东与安徽毗邻,西北与陕西接壤,东南遥望江西,被誉为“九省通衢”。省内有长江汉水浸润,形成了水网密布的独特地理格局。地形复杂多样,以山地为主,呈西高东低特征。除高山地区外,大部分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降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变化,从南到北逐步减少。湖北省是中国古人类化石遗存较丰富的地区之一,发现的建始人、郧县人、长阳人、黄龙洞人等古人类遗迹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些遗存富集程度高、系统性强,凸显了湖北省在古人类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同时,湖北省作为长江文明、楚文化发源地,文化历史底蕴深厚,承载着璀璨的楚文化和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由此衍生出许多特色鲜明的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遗产丰富多彩。

1.2 数据来源

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湖北省1-8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湖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名录(截至2023年9月)为依据,对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梳理,共计1260处。通过整理数据并利用百度地图API获取WGS84坐标,结合ArcGIS10.6软件处理数据,绘制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图。获取地理空间数据云中的高程和河流水系数据以及Open Street Map提供的道路网数据,从数据中提取主要道路数据,包括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等信息。

1.3 研究方法

运用ArcGIS10.6软件,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缓冲区分析等方法研究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

2 结果与分析

2.1 时间分布特征

2.1.1 时序变化特征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将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八个阶段: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这种划分不仅可以揭示文物保护单位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还能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更深入的历史依据和全面的认识。通过图1可以看出,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但不同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先秦时期、明清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这四个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达到1067处,占总量的84.68%。在时间序列上,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发展脉络经历了萌芽阶段、缓慢增长阶段、急速下降阶段和快速拉伸阶段。从史前时期的萌芽阶段,到先秦时期的缓慢增长阶段,增长率为13.6%;从先秦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呈急速下降阶段,达到低谷期时,仅有26处;随后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到近代以来整体呈增长趋势,其中明清时期达到峰值,数量达489处,是宋元时期的6.9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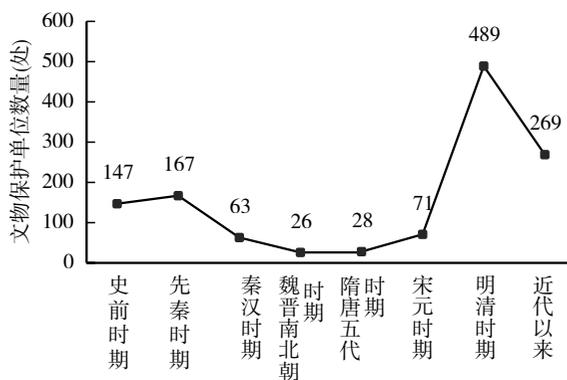


图1 湖北省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从不同时期各类型文物的数量来看(表1),史前时期仅有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以及其他三种类型,其中以古遗址为主,共有144处,占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总量的97.96%。先秦时期,以古遗址和古墓葬为主,此时开始出现古建筑2处。秦汉时期,虽然古遗址仍占主导地位,但古遗址和古墓葬数量开始下降。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期以古墓葬为主。宋元时期以古建筑为主,共有31处,占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总量的43.66%。明清时期是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和类型多样的鼎盛时期,古建筑数量最多,达314处,占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总量的64.21%。近代以来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较为集中,共有252处,占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总量的93.68%。

纵观不同类型文物保护单位(表1),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位居首位,拥有380处。其次是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墓葬,分别为367处、301处、158处。石窟寺及石刻和其他类型数量相对较少。其中,古遗址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和先秦时期,合计264处,占各时期古遗址总量的69.47%;古建筑在先秦时期开始出现,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共314处,占各时期古建筑总量的85.56%;古墓葬集中在先秦时期、明清时期,合计90处,占各时期古墓葬总量的56.96%;其他类型主要出现在史前时期和明清时期。

表1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单位:处

历史时期	古遗址	古墓葬	古建筑	石窟寺及石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其他	总计
史前时期	144	/	/	1	/	2	147
先秦时期	120	44	2	1	/	/	167
秦汉时期	36	25	1	1	/	/	63
魏晋南北朝时期	9	16	1	/	/	/	26
隋唐五代时期	9	11	6	2	/	/	28
宋元时期	16	14	31	10	/	/	71
明清时期	45	46	314	31	49	4	489
近代以来	1	2	12	2	252	/	269
总计	380	158	367	48	301	6	1260

2.1.2 重心演化趋势

借助 ArcGIS10.6 计算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各历史时期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其中长轴代表分布方向,短轴代表分布范围,重心为数据的平均中心。依据表2及图2相关数据得出以下结论:关于分布方向,在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方向为西北-东南;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期,方向转变为东北-西南;从宋元时期到近代以来,又恢复为西北-东南方向。关于集聚度,从集聚到分散的顺序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先秦时期、史前时期、隋唐五代时期、秦汉时期、宋元时期、近代以来、明清时期。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心主要位于京山市、天门市、汉川市和钟祥市。总体而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

布方向、范围和重心上各历史时期存在明显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范围的变化过程。

表2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各类文物保护单位重心变化表

历史时期	重心坐标	长半轴/km	短半轴/km	旋转角度/°
史前时期	113.82°E,30.55°N	214.15	102.62	113.79
先秦时期	113.13°E,31.19°N	191.04	97.89	115.48
秦汉时期	112.53°E,30.59°N	187.54	115.90	107.57
魏晋南北朝时期	113.17°E,30.28°N	202.80	79.45	85.42
隋唐五代时期	113.20°E,30.37°N	256.96	104.09	90.09
宋元时期	113.28°E,30.43°N	255.63	119.12	94.21
明清时期	112.39°E,30.53°N	268.57	129.19	99.20
近代以来	113.63°E,30.41°N	262.77	120.24	9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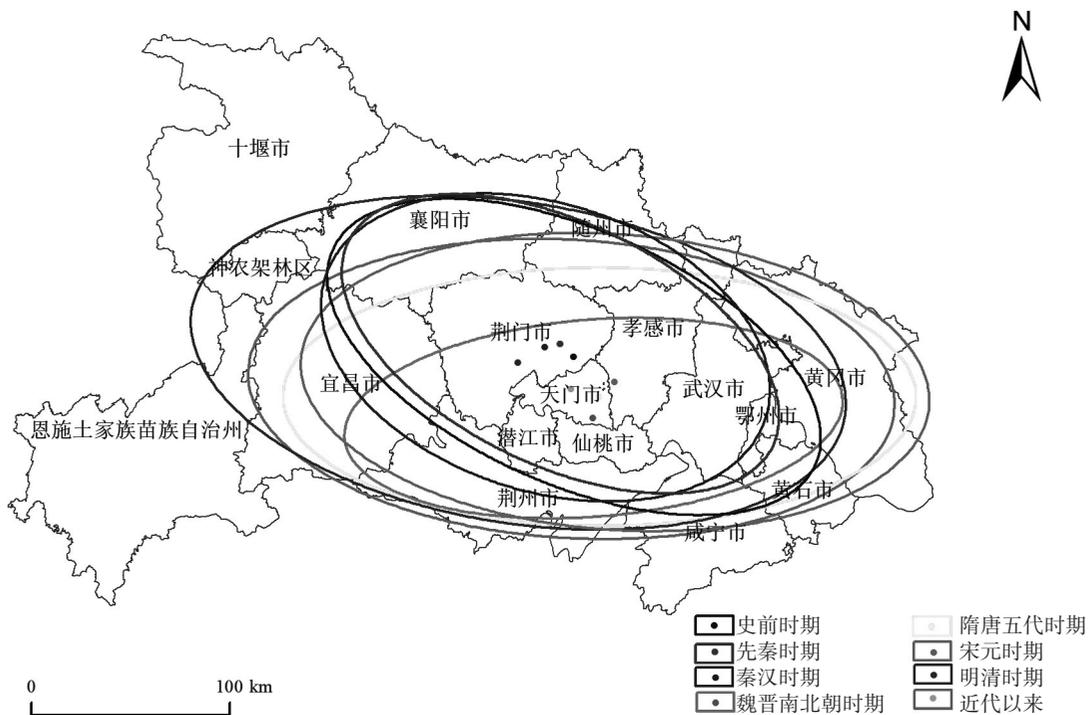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分布图

2.2 空间分布特征

2.2.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最邻近指数计算,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最邻近值为0.67,表明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状态。此外,核密度分析显示(图3),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空间分布呈“一心多点”的特征,其中“一心”区域指以武汉市为核心,而多点分布在鄂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和荆州市等地。武汉市作为核心集聚区位于江汉平原东缘,历史悠久,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古代先民在此聚居,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如老人桥遗址、马投潭遗址等。近代以来,武汉更是近代革命的发源地,拥有75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八七会议会址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单位。相比之下,神农架林区、恩施州等地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较少,这些地区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和分布。

2.2.2 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由图4可知,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情况。史前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0.79,表明该时期湖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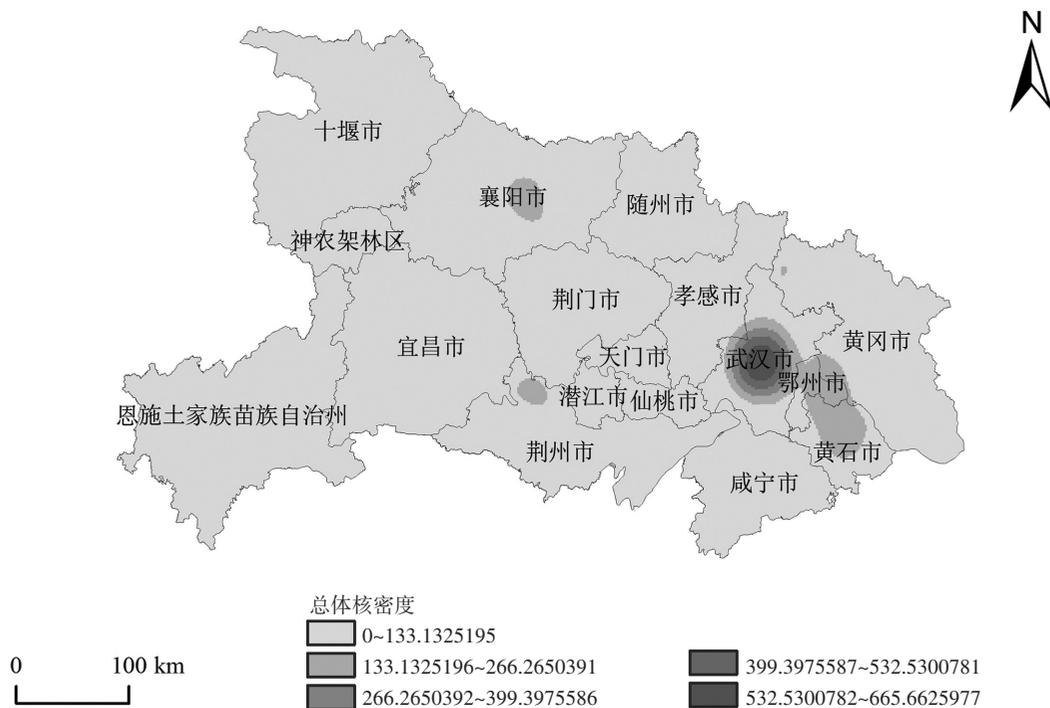


图3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空间核密度

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通过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带状分布,核心集聚区位于荆门市、武汉市、黄石市,次级集聚区位于襄阳市。相比之下,恩施州、仙桃市、潜江市、神农架林和咸宁市等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较为稀少。经考古发现,湖北省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建始步氏巨猿、早期智人长阳人、晚期智人的遗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境内涌现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代表性文化。可以看出,史前时代的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孕育出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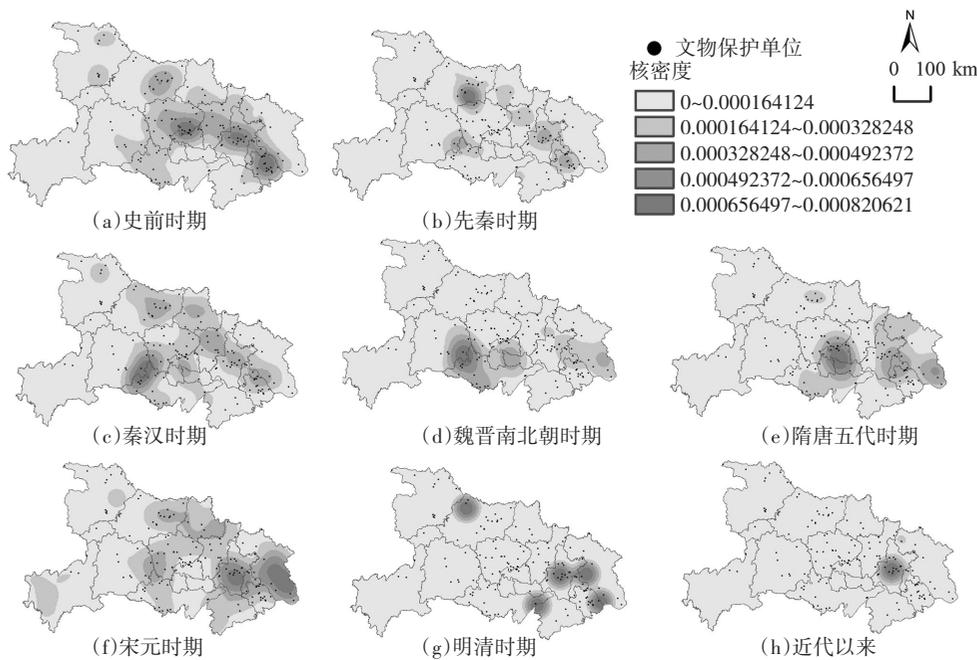


图4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

先秦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0.62,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通过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襄阳市,次要核心区域包括黄石市、武汉市、宜昌市和荆州市的交界处,而神农架林区尚无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从商代末期到战国晚期,湖北省一直是楚国的核心区域,特别是汉

水中游的宜城市,蛮河流经,境内水源充沛、地势平坦。在东周时期,该地区拥有丰富的古遗址,代表性遗址包括南门口遗址、胡家庄遗址等。

秦汉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0.78,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连片状分布,主要核心区位于荆州市与宜昌市接壤处。这一时期,江陵(今荆州市)作为楚国的都城所在地,政治地位突出,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兴盛,政治活动频繁,文化交流密切,使得文物得以遗存。此外,东汉末年,北方经受战乱,人口进行南迁,进而到达此地,也为当地的文化积累和文物保存增添了新的元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郢城遗址、大城壕遗址、铁剑岗墓群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0.59,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零星分散状,仅有26处,主要聚集区位于荆门市与宜昌市接壤处,次级核心区是仙桃市、鄂州市。然而,十堰市、神农架林区、恩施州、随州市、潜江市、咸宁市、孝感市无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这一时期,湖北地区曾是蜀汉和东吴之间争夺的战场。蜀汉和东吴在宜都市、荆州市等地展开了多次战役,如猓亭之战,导致湖北地区频繁受战乱的影响,这些战乱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和保存情况。

隋唐五代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0.99,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两大组团状分布,仅有28处,主要聚集区以天门市为中心涵盖荆门市、荆州市、潜江市、仙桃市、孝感市,次级核心区为以鄂州市为中心的黄石市、武汉市、黄冈市等地。这一时期,政治格局频繁变化,王朝更替频繁,湖北省也经历多次战乱和动荡,如隋末唐初的黄巢起义、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混战和动荡等,导致文物保护单位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和留存。

宋元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0.75,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多核集聚模式,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东部、中北部地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武汉市、黄冈市。这一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在湖北地区盛行,许多寺庙、道观等宗教建筑得到了保护,代表性的有佛母塔、羊角尖舍利塔、舍利宝塔、洪山宝塔等。

明清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1.33,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分散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现五大组团状分散分布,主要分布在武汉市、黄冈市、黄石市、襄阳市、咸宁市。这一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达到巅峰,拥有489处且所有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均有分布。在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中,武昌兼具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也是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地区。汉口以淮盐分销和粮食运输贸易规模巨大而闻名,使得原有的港口无法满足需求。因而,汉口作为典型的商业市镇,拥有便捷的水路交通,吸引了大量商贸活动,成为商业中心。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包括汉口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汉口平汉铁路局旧址、汉口英商和利冰厂旧址等。

近代以来,最邻近指数值为0.66,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一枝独秀”的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武汉市。武汉市在近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的商业繁荣、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中心等,这些历史事件使得武汉市成为保存重要史迹的地区。另外,武汉市作为商业、金融中心,吸引了大量工厂和企业迁入,同时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条件。这一时期,代表性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江汉关大楼、武汉长江大桥等。

整体来看,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情况受到当时政治、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展现出不同的分布特点。

2.3 空间分布相关性

2.3.1 与地形、地貌的相关性

湖北省位于第二、三阶梯过渡地带,地形多样,包括平原、丘陵和山地。地形地貌对人类聚居和活动有重要影响,其中海拔高度和坡度是关键因素。

通过叠加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点数据和高程图分析发现,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数量逐渐减少。如图5所示,在海拔低于200 m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最多,有949处,占比75.31%;海拔处于

200~500 m的文物保护单位138处,占比10.95%;海拔高度处于500~1000 m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达117处,占比9.28%;而在海拔超过1000 m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最少,仅有56处。这表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更多分布在平原地区,平原地区气候宜人,适合人类聚居与活动,也留下了较多的文化遗迹等;而海拔较高的地区气候恶劣,不适宜居住,因此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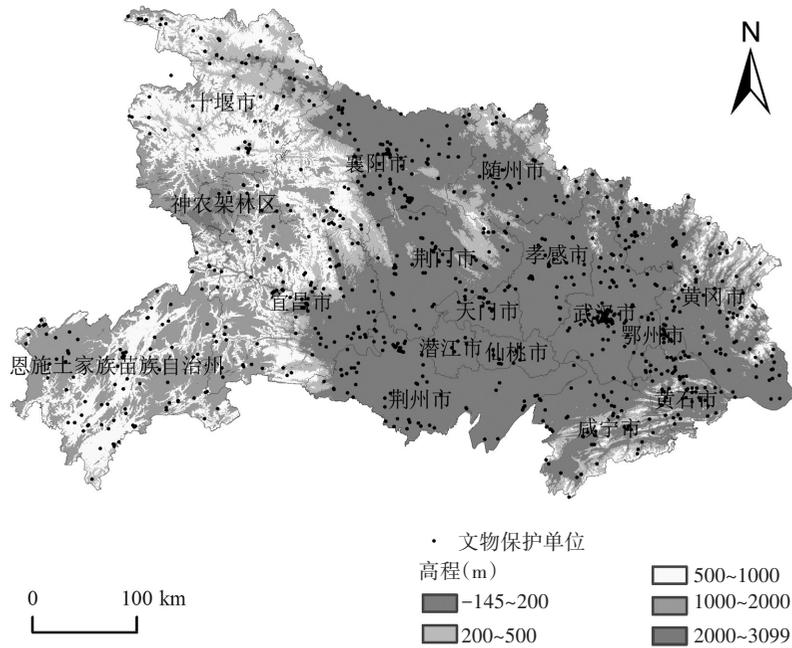


图5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高程分析

通过叠加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点数据和坡度图分析发现(图6),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数量随着坡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如图6所示,坡度在5°以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有809处,占比高达64.2%;坡度在5°~10°之间的有234处,占比18.57%;坡度在10°~20°之间的有152处,占比12.06%;而坡度超过20°的地区仅有65处,数量最少。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平均坡度为5.9°,这表明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更倾向于分布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地区。这一结论与地形地貌对人类聚居和活动的影响相吻合,坡度适中的地区更适宜人类聚居和文物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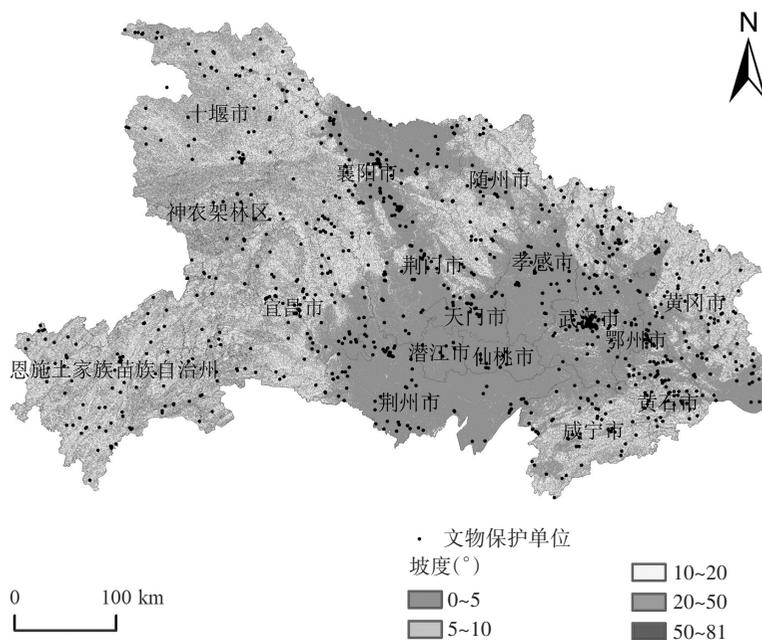


图6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坡度分析

2.3.2 与河流水系的相关性

河流水系关系着人类的生活和发展,同时也是各类文化遗产的源头。在古代社会,人们倚靠河流生存,河流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因此古代文明往往沿河而兴,水源成为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这也促成了文化遗产的产生。湖北省的主要河流有长江、漳河、清江等。借助 ArcGIS10.6 软件,对湖北省河流水系进行多环缓冲区分析,建立 2 km、5 km、10 km 缓冲区,更直观地展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与河流水系的空间关系(图 7)。分布在河流水系 2 km 以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479 处,占比 38.016%;分布于 2~5 km 之间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307 处,占比 24.365%;分布在 5~10 km 之间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241 处,占比 19.127%;分布大于 10 km 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233 处,占比 18.492%。这表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具有明显的亲水性特征,大多分布在靠近水源的区域,这与古代社会依赖水源生存的历史现实相符。这种空间关系不仅反映了文物保护单位与河流水系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凸显了古代文明沿河而兴的历史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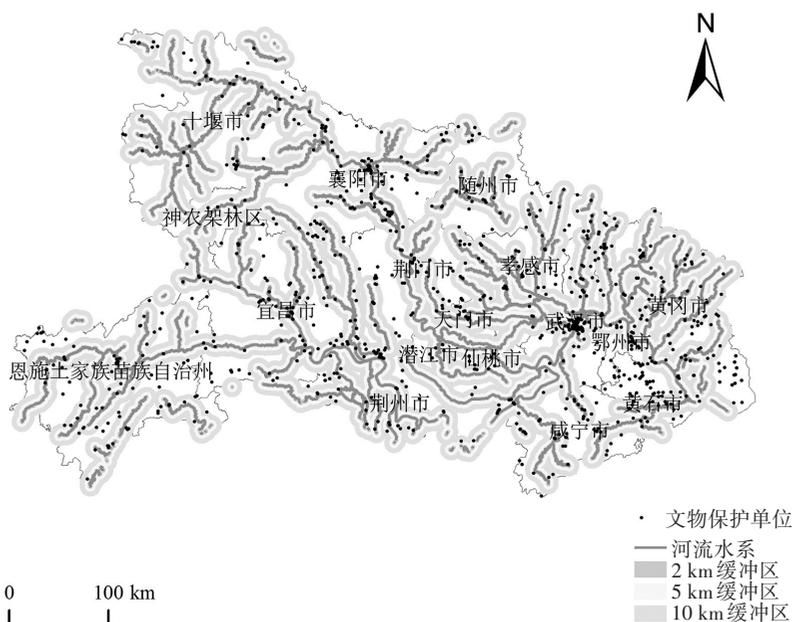


图7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河流水系缓冲区

2.3.3 与交通的相关性

交通作为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纽带,直接影响着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和深度,进而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传承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地理分布往往受交通条件影响,交通便捷度则直接影响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数量。公路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方式,不仅连接了各地文化遗产,更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利用 ArcGIS10.6 软件,选取湖北省高速、国道、省道为研究对象,建立 2 km、5 km、10 km 缓冲区,并将这些缓冲区与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叠加分析(图 8)。其中,分布在道路 2 km 以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675 处,占比 53.57%;分布在 2~5 km 之间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256 处,占比 20.32%;分布在 5~10 km 之间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255 处,占比 20.24%;分布在距离道路 10 km 以外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74 处。这表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与交通线路的分布呈正相关,便捷的交通促进了湖北省各地区的交流,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2.3.4 与城市中心的相关性

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沿城市中心的分布状况进行研究,以各地市州的行政中心为圆心,分别以 20 km 和 50 km 为半径,利用 ArcGIS10.6 平台建立多环缓冲区,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叠加(图 9)。统计结果显示,在各行政中心半径 20 km 范围内,共有 331 处文物保护单位,占比 26.3%;在 20~50 km 范围内共有 466 处,占比 36.57%;在 50 km 之外有 463 处,占比 34.6%。值得注意的是,50 km 内共有 797 处文物保护单位,占比 63.35%。由此可见,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受行政中心的影响,距离行政中心越近,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越多。这种分布模式反映了文物保护单位与行政中心位置的关联,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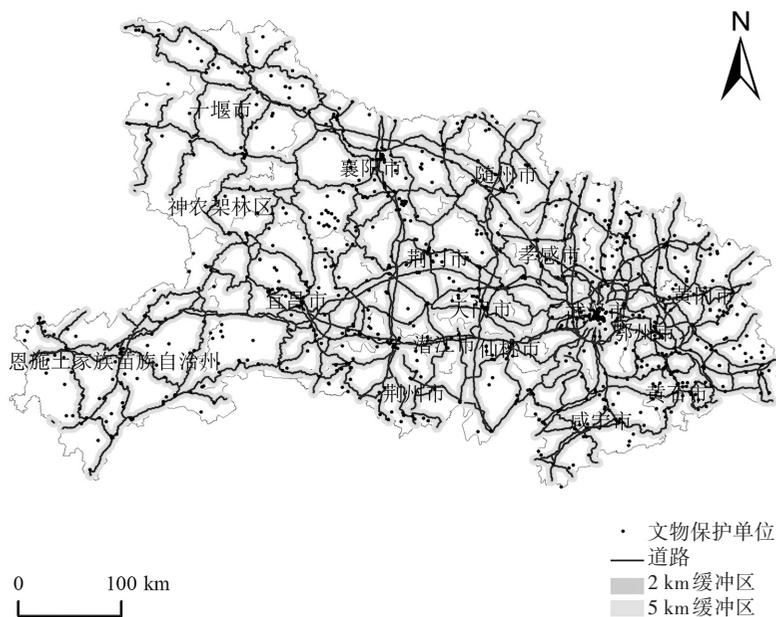


图8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道路缓冲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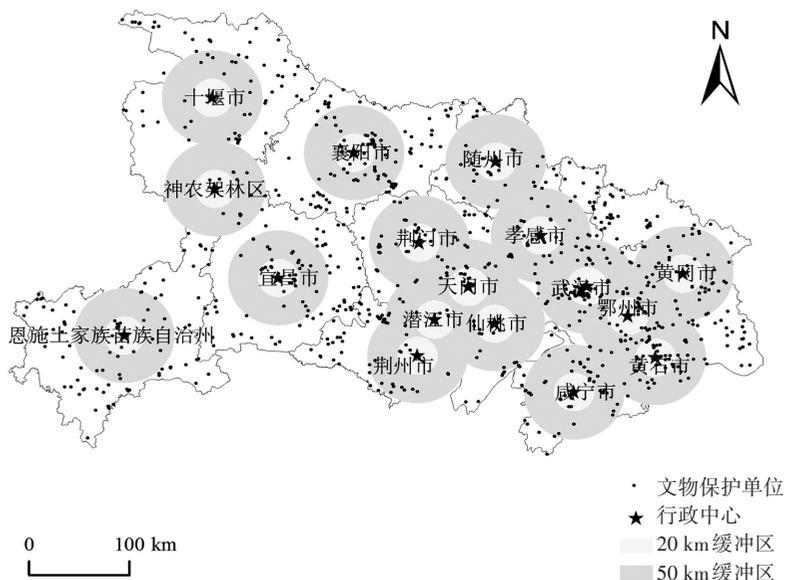


图9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空间核密度

2.3.5 历史文化相关性

通过定性分析研究发现,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湖北省现存的1260处文物保护单位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稳定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留存;动荡的政治环境容易使文物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不断,导致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仅有26处,遗存较少,达到了低谷期。在明清时期,湖北省作为文化古都,拥有众多文物保护单位,如黄陂古城、黄鹤楼等。政治稳定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当时的湖北省文物得以保存和传承。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湖北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文物保护工作得到重视,许多古迹得以修缮和保护。这一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和规模均有所增加,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3.1.1 时序方面

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但不同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

量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先秦时期、明清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这四个时期文物保护单位达1067处,占总量的84.68%。在时间序列上,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发展脉络经历了萌芽阶段、缓慢增长阶段、急速下降阶段、快速拉伸阶段。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方向、范围、重心上各历史时期差异明显,也表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范围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3.1.2 空间方面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空间分布特征呈集聚型且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汉市,不同历史时期除明清时期为分散状态,其余均为集聚状态。史前时期核心集聚区位于荆门市、武汉市、黄石市;先秦时期主要集中在襄阳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核心区位于荆州市与宜昌市接壤处;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分布在天门市;宋元时期以武汉市、黄冈市最为集中;明清时期,主要分布在武汉市、黄冈市、黄石市、襄阳市、咸宁市;近代以来,主要分布在武汉市。另外,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受地形地貌、河流水系、交通、城市中心、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特征,反映了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之间的紧密关系。

3.2 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时空分布上存在差异,整体空间分布呈现“一心多点”的特征。针对这一现状,文物保护单位的开发利用要结合实际情况。对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密集区域,如武汉市、鄂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和荆州市等地,建议引入数字化手段。一方面,促进文物保护单位朝着活态化的方向发展,使得文化得到更好传承;另一方面,借助科技手段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智能化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同时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体验。然而对于文物保护单位密度低的地区,要深入挖掘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核,鼓励社区参与,提升文物保护单位的影响力。同时,对于那些符合标准但尚未申报的文物保护单位,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其进行申报工作,使其得到正式的认定和保护,进一步丰富湖北省文化遗产保护网络。

此外,由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跨度长、数量多,对于一些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单位,在地理空间坐标的采集过程中,由于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地理位置偏僻,不得不采取就近原则进行估算,这可能导致一定的坐标误差。同时,在进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分析时,由于涉及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分析得不够深入。这些不足需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EB/O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5748.htm?sid_for_share=99125_3. 2015-08-10/2021-05-05.
- [2] 田家兴,郝静,单彦名,等.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市域历史文化资源空间保护体系构建探索——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22,29(01):60-65,81.
- [3] ABDELHAMID B M, PAUL N. Pay or Preserve: A New Approach to Valuing Cultural Heritage[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 8(01):2-16.
- [4] AGAPIOU A, LYSANDROU V, ALEXAKISI D D, et al.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Using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GIS: The Case Study of Paphos Area Cyprus[J]. Computers, Environment & Urban Systems, 2015, (54):230-239.
- [5] MAIKHURI R K, NAUTIYAL S, RAO K S, et al. Conservation Policy—people Conflicts: A Case study from Nanda Devi Biosphere Reserve (A World Heritage Site), India[J]. Forest Policy & Economics, 2007, 2(03):355-365.
- [6] BENAGES M, ALBERT. Revisiting the Appropriation of Space in Metropolitan River Corrido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5, 42:1-15.
- [7] SYAFRINI D, NURDIN M F, SUGANDI Y S, et al. Transformation of a Coal Mining City into a Cultured Mining Heritage Tourism City in Sawahlunto, Indonesia: A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Becoming a Ghost Town[J]. Tourism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22, 19(04):296-315.
- [8] 刘明欢. 贵州平塘县文物保护单位现状调查报告[D]. 贵州:贵州民族大学, 2023.
- [9] 李文强. 宝鸡市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现状调研报告[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
- [10] 王益. 贵州省凤冈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与利用调查报告[D]. 贵州:贵州民族大学, 2023.
- [11] 李蝶,王伟,张野,等. 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3, 42(02):173-180.
- [12] 岳菊,戴湘毅. 京津冀文化遗产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2):221-230.

- [13] 吴佳倚,陈亚颀,焦敏,等. 云南省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23, 46(05): 52-62.
- [14] 康雪琴,谢晓玲. 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3, 18(04): 114-122.
- [15] 董洁芳,张仲伍,李剑锋. 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运城学院学报, 2023, 41(06): 17-25.
- [16] 刘丽华,何军,韩福文,等. 我国东北地区近代工业遗产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解读——基于文物保护单位视角的分析[J]. 经济地理, 2016, 36(01): 200-207.
- [17] 康峰,张子博,曹如姬,等. 太白铁路沿线工业遗产时空分布特征与遗产廊道适宜性构建[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01): 40-51.
- [18] 戴湘毅,阙维民. 中国矿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分析——基于文物保护单位视角[J]. 地理研究, 2011, 30(04): 747-757.
- [19] 冷静,贺圆圆. 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及其时空分布特征研究[J]. 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2021, 23(06): 83-85.
- [20] 王秀伟,郭智嫻. 红色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基于31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J]. 南方文物, 2021, (02): 102-110.
- [21] 徐皖,张建国. 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时空分布与演变特征[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6(07): 50-57.
- [22] 奚雪松,许立言,陈义勇,等. 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J]. 人文地理, 2013, (01): 75-79.
- [23] 田小波,胡静,徐欣,等. 历史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机理[J]. 经济地理, 2021, 41(01): 191-201.
- [24] 林晓峰. 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化特征研究[J]. 河北省科学院学报, 2018, 35(01): 78-86.
- [25] 徐卫民,曾丽荣. 陕西省文化遗产时空分布格局及形成因素研究——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1(03): 438-446.
- [26] 郭宏琴.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19.
- [27] 白如山,刘恺恺,张玥,等. 安徽省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文物保护单位的视角[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04): 378-384.
- [28] 蔺慧媛. 武威市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兰州:兰州理工大学, 2024.
- [29] 赵春梅,黄学渊,张蕾,等. 成都市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北京测绘, 2022, 36(05): 636-643.
- [30] 王崇岩,曹家和. 西安市中心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特征分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23, (12): 247-249.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Province

LI Ling, ZHANG Li-ming*, TAN Ben-yu

(College of Tourism,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are a precious heritage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cording the imprints of history. Studying their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helps to strengthe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1,260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province are studied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buff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mporal aspects: (1)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province has a wide time span, from prehistory to modern times, and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al vein of germination, slow growth, rapid decline and rapid stretching, mainly focusing on the four periods of prehistory, Pre-Q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modern times; (2)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 scope and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Spatial aspects: (1)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gglomeration type, except fo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are scattered, the other periods are agglomeration type; (2) The spatial evolution gradually and progressively form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one center and many points, one center is centered on Wuhan City; (3)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s affected by the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 the river and water system, the traffic, the urban center 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Hubei province